

影响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是

政治因素

主编 / 杨龙 副主编 / 宁守波

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F124/46

影响新中国 经济发展的 政治因素

主编 / 杨龙 副主编 / 宁守波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ZB3P31/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影响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因素 / 杨龙著 . -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11
ISBN 7-80563-856-X

I. 影… II. 杨… III. 政治-影响-经济发展-研究
-中国-1949~1999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8935 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荣长海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电话 / 传真：(022) 23366354 (办公室)
 (022) 23003323 (发行科)
电子信箱：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铁道部第十八工程局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50 千字
版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18.00 元

目 录

导 言 影响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政治因素	(1)
第一章 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	(9)
第一节 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9)
一、意识形态的涵义与结构	(9)
二、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2)
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	(15)
四、中国意识形态的变迁与延续性	(19)
第二节 过渡时期意识形态与国民经济的发展	(21)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	(22)
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与社会主义改造	(27)
三、苏联工业化战略思想的影响	(32)
第三节 “左”倾意识形态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35)
一、毛泽东“左”倾思想的发生和发展	(36)
二、“左”倾意识形态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38)
三、“左”倾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经济	(42)
第四节 新时期意识形态的演进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46)
一、新时期意识形态的演进及其基本内容	(46)
二、“实事求是”思想的恢复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	(49)
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与对外经济的发展	(52)
四、意识形态的突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54)

五、中国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互动的展望.....	(56)
第二章 新中国的政治领导方式与经济发展	(59)
第一节 政治领导方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59)
一、政治领导方式的含义.....	(59)
二、政治领导方式的特点.....	(61)
三、政治领导方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62)
四、研究政治领导方式的意义.....	(63)
第二节 中国政治领导方式的特点	(64)
一、党的领导地位.....	(64)
二、善于领导和发动群众运动.....	(67)
三、政治斗争的频繁出现.....	(70)
四、以民主集中制为特点的决策机制.....	(73)
五、强调财政手段的重要作用.....	(74)
第三节 强调党的领导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经济后果 ...	(76)
一、建国初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和经济的发展.....	(77)
二、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	(79)
三、新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完善.....	(80)
四、民主集中制的形成与发展.....	(82)
五、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有利于经济发展.....	(84)
六、破坏民主集中制妨碍经济发展.....	(85)
七、新时期民主集中制的健全和发展.....	(85)
第四节 政治斗争和坚持群众路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87)
一、建国初的政治斗争对经济恢复的重要作用.....	(87)
二、政治斗争滥用的严重后果.....	(87)
三、拨乱反正的决定性意义.....	(88)
四、建国初期的群众运动发挥的积极作用.....	(89)
五、“大跃进”运动及“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阻碍.....	(90)

目 录

六、新时期的群众动员.....	(92)
第五节 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推动与制约	(94)
一、建国之初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的政治动机.....	(94)
二、财政政策调整的政治原因.....	(94)
三、新时期财政的政治功能.....	(97)
第三章 新中国的国内政治局势与经济发展.....	(100)
第一节 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与经济绩效的相关性.....	(100)
一、国内政治局势的含义	(100)
二、国内政治局势与经济绩效的相关性	(104)
三、中国政治局势的总体概况	(105)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政治改造与经济起步.....	(107)
一、建国初期战胜险恶的政治环境	(107)
二、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与工商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110)
三、政治局势稳定后的政治改造和生产改造运动	(114)
四、中共“八大”的召开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119)
第三节 “运动”中的政治局势变化与经济波动.....	(120)
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及其对经济建设的影响	(121)
二、庐山会议对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127)
三、60年代初对政治关系的调整与国民经济的恢复	(130)
四、“五反”和“四清”运动与 60 年代初到“文革”前经济建设的探索	(133)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非常态政治局势中的经济建设	(135)
一、“文化大革命”十年政治局势的起伏	(135)
二、“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的消极影响	(138)

影响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因素

第五节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局势的变化与经济走向	(141)
一、围绕权力代际交替的政治局势	(141)
二、变革政治局势中的经济建设	(144)
三、三中全会后对政治关系的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	(145)
四、1982年宪法：为经济体制改革保驾护航	(148)
五、学潮及政治风波与经济发展	(148)
六、南巡谈话：1992年以后政治、经济形势的转折	(150)
第四章 新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与经济发展	(152)
第一节 政治权力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152)
一、政治权力结构的涵义	(152)
二、政治权力结构的特点	(154)
三、政治权力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62)
第二节 我国政治权力结构的特点	(169)
一、党居于我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	(169)
二、权力集中与权力分散是权力结构变动的主题	(171)
三、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与政府职能转变密切相关	(174)
四、“条块”矛盾与政治权力结构内部的张力	(179)
五、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	(183)
第三节 建国初期中央集权对经济的促进	(186)
一、过渡型的政治权力结构	(186)
二、新的政治权力结构建立	(192)
三、新政治权力结构的特点	(198)
第四节 初次向地方分权的功与过	(201)
一、政治权力结构与经济的发展不适应	(201)
二、政治权力结构一度失常	(205)
三、政治权力结构超前调整的副作用	(208)
第五节 政治权力结构非正常变动的恶果	(213)
一、调整时期权力结构对经济的积极作用	(213)

目 录

二、政治权力结构首次遭到严重破坏	(217)
三、“文革”中政治权力结构的重组	(219)
四、“文革”后期动荡中的政治权力结构	(224)
第六节 改革前期“让利放权”的正效应.....	(227)
一、政治权力结构的惯性	(227)
二、通过权力的分散与下放驱动经济	(228)
三、政治权力结构的转变与“六五”计划的顺利完成 ...	(231)
四、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权力结构的深层触动	(236)
五、80年代后期的第二次放权	(238)
第七节 90年代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经济效果	(242)
一、90年代政治权力结构的新特点	(242)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246)
第五章 新中国的社会分化与经济发展.....	(251)
第一节 社会分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251)
一、社会分化的含义与特点	(251)
二、社会分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54)
第二节 新中国社会分化的特点.....	(257)
一、社会分化的阶段性特征及分化与整合的循环发展	(257)
二、社会分化由简单、一元化向复杂、多元化发展	(259)
三、社会分化由人为性和封闭性向自发性和开放性转变	(259)
四、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标准由偏重政治走向回归经济	(260)
五、社会分化是社会变化的主导方向	(261)
六、社会分化的动力来自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动	(262)
七、中国领导层重视对社会分化的利用	(263)
第三节 建国初期至“文革”期间的分化与整合.....	(263)

影响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因素

一、建国初期：局部整合的积极作用	(263)
二、城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反分化的功与过	(269)
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反分化走上极端的恶果	(273)
四、调整时期：以局部分化整治过度整合	(275)
五、“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几乎全部被打乱	(276)
第四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分化与经济发展	(280)
一、社会分化自农村始	(280)
二、城市分化蹒跚起步	(283)
第五节 市场化改革中的分化与发展	(287)
一、市场化改革中对分化的强调	(287)
二、90年代社会分化的新特点	(290)
三、社会分化负效应的进一步突出	(292)
四、我国社会分化的未来走势	(296)
结语 几种政治因素在影响中国经济时的相互关系	(304)
后记	(309)

导言 影响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政治因素

建国 50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既有过经济的多次飞跃，也发生过几次大的波折。作为一个经过国内战争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国家，政治因素，比如国内力量的对比、政治权力的分配、意识形态的调整等，对经济的影响一直是十分直接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十分密切，经济的几次波动均有政治原因。政治一直是左右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

一、意识形态的指导

意识形态通过影响人的行为，包括决策者和民众，作用于社会的经济。作为一个通过国内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始终有着十分直接的影响。新中国的建立，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结果。建国以后的 50 年里，意识形态的几次调整，影响到整个社会实践，给经济带来重大影响。意识形态在中国具有强烈的指导性、强制性和深入性。党对社会的统治借助意识形态来论证其合法性，党和国家通过意识形态手段统一群众的思想，实现党和国家的意图。通过高强度的思想工作，大规模有针对性的说服教育，用来改造人的世界观，塑造新的人生观。意识形态在中国具有强烈的指导性。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苏维埃俄国的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结果，前半个世纪中国革命的曲折和成就也伴随着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斗争。建国以后的政治和经济先后处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

下，几次思想和路线方面的斗争和修正，都带来直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有人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没有邓小平理论，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强调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中国意识形态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意识形态是“一种总的和前后一致的世界观，它能被强烈地感受到和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予以坚持。”^①在中国，意识形态是政治领导的一部分。一是党对社会的统治借助意识形态来论证其合法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明确地强调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邓小平同志把我党的意识形态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把它写入宪法，不允许动摇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信念。二是政治领导中包括对意识形态的管理和统治，利用宣传和舆论导向的作用，党和国家通过意识形态手段统一群众的思想，实现党和国家的意图。所以我党一贯注重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以证明政治统治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深入性也是中国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50年来，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制定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有关意识形态的方针、政策，以群众性马克思主义普及运动和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通过演讲、座谈、学习、自我批评等方法，利用政治体制的各个部分和各种媒体，经过反复的宣传、教育，使党的意识形态深入人心。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创新与发展，通过高强度的思想工作，大规模有针对性的说服教育，用来改造人的世界观，塑造新的人生观。另外，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动员人力资源，也是一种激发积极性的手段。

这50年里意识形态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应归功于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指导，1953年

^① 艾克纳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中共中央提出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五”计划成功的路线保障。50年代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大跃进”的冒进、人民公社的“穷过渡”等重大政治经济失误，都与意识形态上的“左”倾有直接的关系，十年“文革”把意识形态的消极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起步离不开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强调完整、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近20年里，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从党的十四大再到十五大，从姓“社”姓“资”之争到把多种所有制成份写进宪法，改革开放的历程伴随着意识形态的不断调整。

二、政治领导方式的作用

“政治领导方式”这一提法是针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状况而言的。中国常见的政治领导方式有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把经济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以政治斗争为经济政策开路、坚持党对全局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利用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财政政策的政治运用等。之所以认为政治领导方式对中国的经济有重要影响，是因为50年里中国对社会各个方面的领导经常性地以政治的方式进行。政治领导方式的频繁使用与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有关，与我党曾有过长期的革命战争传统有关，还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政府的推动有关。

政治领导方式的优点是其效率高。凡事确定下来以后，一旦提到政治的高度，各级各地各部门均会高度重视。但快速决策，迅速推行的另一方面是一旦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也会以很快的速度蔓延，使得社会付出高代价。政治领导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有利于社会的整合。我国坚持党对全社会的领导不能动摇，辅以群众路线的方式，在通过政治教育强化的同时，辅以广泛的动员，使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全局观念常在，经常性地保持高度一致。这一点尤其适合中国这样地域广泛、地区差异较大、多民族的超大型国家的管

理。政治领导方式这个特点的另一方面是一旦决策失当，其后果也是全国性的。为了实现整合的目标，政治斗争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政治斗争的目的是明辨是非，方法是区分敌我。政治斗争有一种威慑力量，是统一意志的有力工具，但在使用中敌我界限不好把握，极容易出现“扩大化”现象。政治领导方式的第三个优点是灵活性，政治领导方式大都具有辩证性和弹性，在决策和管理时可以根据局势的要求，灵活掌握。比如民主集中制中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可以根据决策时的不同需要，或是强调民主，或是强调集中。再比如对我国的改革进程，既讲“发展是硬道理”，也讲“稳定压倒一切”，不同的时候政策的重点不同。但是，如果灵活性过度，一是可能会离开决策科学化的轨道，返回“人治”的老路；二是可能导致对待政策的“工具理性”态度：把政策当作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不管目标是否正当。

政治领导方式有人格化的色彩。在我国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群众的发动、对政府目标的认同、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变等关键关头，高层领导的言行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领导人的人格力量在我国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高明的决策层大都善于利用它。但突出领袖的决定作用难免在决策和管理中出现长官意志，以权代法，违背领导科学规律，因此这项政治领导方式的运用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

三、国内政治局势的左右

国内政治局势指的是国家内部在一定时期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各种政治关系的变动所形成的政治状态。局势是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环境，政治局势是否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了那个时期经济是否能够取得成功。一般而论，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局势，但如果稳定走向极端，就成了僵化。僵化的社会缺乏活力，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总的说来，不稳定是消极的，但有的时候，为了打破社会的僵化，需要某种冲突或一定程度的波动。换句话

讲，稳定的局势不一定都是有益于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也不都是消极的。

国内政治局势变动的标志是重大事件的发生，外敌入侵、国内政治事件、经济波动、重大自然灾害等都可能导致政治局势的变动。抗美援朝对军需品的大量需求刺激国内相关经济行业的发展，并成为建国初期凝聚国内民心的政治内核。中苏关系紧张导致“深挖洞，广积粮”和“要准备打仗”的发展战略转移，根本改变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三年自然灾害以生命的代价使决策层从大跃进“超英赶美”的幻想中清醒，经济冒进终于得到遏止，等等。

上述重大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政治局势的剧变，反过来也可以人为地造就某种局势，以达到政治或经济的目的。1992年，经过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三年的治理整顿，中国的经济处于低谷，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打破了沉闷的局面。南巡谈话在全国迅速传播，中央动员全党全国学习领会，各地各部门纷纷表态支持，紧接着在党的十四大上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高潮随之兴起。某种程度的动荡也是可以利用的，这是一种处理危机的艺术。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原有的政治平衡被打破，社会利益将重新分配。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机会，个人的积极性因此得以调动。精明的领导人可以利用危机进行利益重组，以此来激励社会。50年里中国的政治局势有过几次大的起伏，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八九风波”等局势的几次大起伏对经济的破坏是毁灭性的，这个教训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因此尽管政治局势可以作为动员的手段，但局势可能失控，比如“文革”，毛主席最初的计划是三年搞完，但一下子成了十年动乱，因此对政治局势的发动和利用一定要谨慎。

四、政治权力结构的制约

一个社会中各种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构成该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权力结构反映的是利益分配格局，利益的不同分

配方式对社会中各种集团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不同的影响，政治权力结构由此作用于社会经济。政治权力结构在水平方向上是几种国家权力的关系，在中国主要是立法权与行政权，党、政府、人大以及其他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等。在垂直方向上主要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上级与下级的权力关系。从整体上看，还有政治权力与社会的关系等。中国政治权力结构在这几个方面近 50 年里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动，经济随之发生对应性波动。

行政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调整对中国经济有着直接的影响。新中国经济基础的奠定是一个经济权力集中的过程。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主要是凭借国家权力，建起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国家掌握市场的控制权，政府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一五”计划的成功也依赖权力的集中。分权也曾对中国的经济起过积极的作用。1978 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是从分权开始的，近 20 年里中央与地方在收权与放权之间有过几次反复，改革的成功最终取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在财权和事权、所有权与管理权等之间的科学划分。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政治权力结构的一种重要体现。不同的政治权力结构反映了政府对社会的不同控制程度，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取决于特定时期政治的或经济的需要。中国政治权力结构变动还体现为党的权力的合理调整、人大和政协的权力增加等方面。随着国家与社会在权力边界上的变动，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的重新分配，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党对全社会的领导的前提下，中国的党政关系、党企关系、党与公民的关系等已经有所调整，对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政治权力结构变动还体现为党的权力的合理调整、人大和政协的权力增加等方面。随着国家与社会在权力边界上的变动，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的重新分配，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党对全社会的领导的前提下，中国的党政关系、党企关系、党与公民的关系等已经有所调整，对经济起到积极的促

进作用。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除了党管干部之外，主要体现在监督保证作用上。对非公有制企业，党不实行直接的领导。对政府部门，有的只设党组。与此同时，人大和政协的权力明显增强。人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立法方面，自提出“依法治国”的方针以后，各级人大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工作，目的是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管理逐步走上依法治理的轨道，以填补党调整对社会的管理以后出现的秩序空白。政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监督方面，政协的成员主要来自各民主党派和其他无党派人士，他们也是各界的精英，其代表性很广。他们对党和政府的干部、企业的领导人的监督作用是其他机制所无法替代的。

政治权力结构也是一种决策机制，在其中各类权力主体相互作用。从静态上，政治权力结构反映的是特定社会中的政治关系，即各种权力主体在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从动态上，政治权力结构反映的是不同权力主体通过特定的相互作用方式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人大和政协在利益综合和利益表达方面的重要作用愈发显现，对政府的正确决策，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还包括地方之间的政治关系。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经济背景下，地方政治关系对各地的经济，进而对国家的经济整体也会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随着中央向地方的放权，地方独立的经济利益逐渐增多，作为在政治上地位相同的地方政府，经济上的合作和联合缺乏制度上的动力，更愿意做的是维护地方自己的利益。建国以来，曾短期实行过大区制，但很快改为省制。近20年来，又先后增设了特区、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行政建制，目的在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到目前关于跨地区，特别跨省的经济合作应采取何种模式，仍在摸索之中。

五、社会分化的影响

社会分化包括阶层之间、人群之间的分化；产业之间、行业之

间、职业之间的分化；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分化；政治与经济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化等几大方面。社会的分化在两个方向上展开，纵向上基本表现为社会的分层，横向则以社会分工为核心。社会的分化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动，结构上的分化导致功能上的分化，其背后是社会利益的分化。由于利益是个人行为的驱动器，分化与经济的联系得以建立。

新中国分化与反分化（整合）对经济均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建国初期在国民经济恢复中没有即刻推进新的分化，这个政策对于解决就业，提供生活必需品，以及经济的恢复起到积极的作用。“大跃进”中反分化过于极端，农村中任何社会和经济上的差别均被消灭。结果不少地方吃光了集体的积累，农民的生活难以为继，甚至饿死了人，经济也受到人为的摧残。60年代初期的经济整顿中，自留地、农贸市场、个体手工业等再度出现，以部分地恢复原有的分化作为重整经济的手段。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振兴离不开社会的分化。以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镇中个体工商业为开端的新一轮社会分化，就是建立在对“文革”期间反分化过头的否定的基础之上，改革后第一次经济高潮随之到来。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及随后对宪法的修改，对私人资本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合法地位给予确立，是对社会分化的又一次肯定。这就为中国下一步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提供了制度环境。

不同的分化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果，并非所有的分化都有利于经济发展。近20年里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是一种分化过度，贫富差距过大造成阶层之间的冲突，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大可能引起地区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不稳定的来源之一。由于这种分化导致潜在的社会对立，社会经济发展随时可能因突发的冲突而受到冲击。由于社会分化具有这种两面性后果，对于社会的分化必须加以控制，使之保持在有利于激发社会积极性，不危害社会稳定的程度之内。